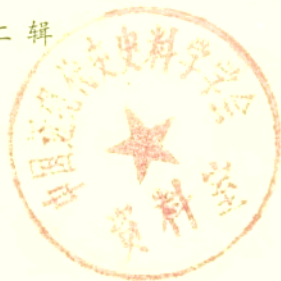


1407

建陽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095/22

张翼同志谈解放初期建阳县的接管工作

建阳县是在1949年5月11日凌晨4时解放的。解放建阳的部队是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几天后，在人民解放军进城部队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人民治安委员会和人民工作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工作和代行县政府的部份职能。六月初，新组建的中共建阳地委调我到建阳，负责组建中共建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进行政权的接管工作。八月中旬，我调回专署，建阳的工作移交给山西南下的同志。现在，我将个人所了解的和本人在建阳工作期间的工作情况作个大体的回顾，提供同志们参考。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极为迅速。在三野部队围攻上海期间，二野的部队迅速南下追击国民党溃退的部队。四兵团所属十五军，五兵团所属十七军，分别从江西上饶和浙江江山两路进入福建闽北。从上饶入闽的十五军，5月9日解放了崇安，11日解放建阳，13日解放建瓯和水吉，14日解放南平、19日解放邵武。从江山入闽的十七军，13日解放浦城，19日解放松溪，23日解放政和。前后仅十五天时间，闽北全境九个县就都解放了（光泽县当时属江西省管辖，故未计入）。从以上所列闽北各县解放的日程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军事形势的发展十分迅速，大批国民党溃军涌入闽北，各县国民党伪军政头目们只顾讨好这些败兵们，不顾百姓死活，因此各地社会秩序极度混

乱，建阳也不例外。建阳老百姓最遭殃的是在五月上旬。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期间，大约有30万国民党溃退的部队经过建阳，其中主要的是邱清泉兵团，另一个是国民党杂牌的68军刘汝明的部队。这两股残兵败将，一路抢掠烧杀奸淫，制造了无数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的惨状。当五月九日崇安县解放的消息传出后，各地国民党的反动官员们更是惊恐万状。建阳县县长任自强，国民党书记长刘景刚，参议长冯克明，自卫总队长聂国焕等，来不及对粮库、档案和交通等进行大的破坏，就仓惶逃跑了。在我们自己这方面，也因为形势发展太快了，普遍来不及到城里来迎接解放军。全闽北只有崇安一个县是由游击队带领解放军进城的，其他各县都是解放军先到，我们游击队随后才赶到的。

在建阳，我们地下党、游击队是分四批进城的：

第一批：进城时间是1949年5月13日。进城的游击队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纵队直属第二支队。这个支队是在年初我纵队主力北上江西途中，留下在建阳的华家山、太阳山区牵制敌人并坚持斗争的。他们在接到崇安已经解放的消息后，在支队长赖求兴的率领下，一路收缴了茶布、莒口、后山等乡反动民团的武装后进入建阳城。他们进城后，还荣幸地受到了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现任国防部部长）的热忱接见和宴请。二支队随后留在建阳转入地方工作的有两位同志，一位是叶宗忠同志，一位是高振良同志。

第二批人员到达建阳的时间是五月底六月初。当时，我地下党的闽浙赣省委机关驻在建瓯，与解放军联合组成建瓯军管会，陈贵芳同志受省委的委派，到建阳组建中共建阳地委和建阳专署的领导

班子。陈贵芳同志任地委书记，我在专署也挂了个职务，但仍在浦城工作。

第三批进入建阳的人员是我，时间在六月初。陈贵芳同志到达建阳组建地委和专署的班子之后，就下令把我从浦城调来建阳，要我负责组建建阳县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并任命我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我接到地委的命令后，把浦城的工作移交给池云宝同志，带上几个武装便动身来建阳。

第四批来建阳的是城工部的同志，时间在六月中旬。五月中下旬闽北全境解放后，省委将分散在闽北各县的城工部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建甌进行集训，学习期满后分派到各县工作。派来建阳工作的有五位，他们是：白文、陈达、余力、徐干忠、傅春龄。

以上四批进入建阳的人员，除地委、专署的班子之外，实际在建阳县工作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共只有九人，偌大一个建阳县的工作担子，都压在我们这九个人的肩上，可以想象，这付担子的沉重程度。

建阳县从五月十一日解放到八月廿一日，南下同志全部到达岗位为止，总共102天的时间里，政权建设先后经历了五次机构更易：

第一次机构建立的时间是五月十一日至十六日。解放建阳的一三四团进城后，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阳县工作队。负责人是张梓清和华锋两位同志，他们都是一三四团的负责干部。工作队的任务是一方面负责接管建阳县旧政权，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筹备成立一个过渡性的机构，代行县政府部分职能，维持社会治安，物色当地人士进入这一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次机构建立、存在的时间是五月十六日至廿八日，机构名称是：建阳县人民治安委员会，明确规定委员会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阳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个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是：首先，由工作队物色出当地四位人士出面负责筹备，于五月十六日邀集建阳县各界人士二十四人开筹建会议。会上，经过充分酝酿，推选出九人组成建阳县人民治安委员会。该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下设三股一站，即治安股、工商股、供应股和柴草站。具体人选是：治安委员会主席陈文彬（原国民党参议员），委员兼治安股股长徐智深（原国民党建阳县警察局股长），委员兼工商股股长卢公范（原建阳县商会会长），委员兼供应股股长朱桂溪（原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委员兼柴草站站长武子德（原建阳地方绅士，曾任建阳城区区长）。

建阳县人民治安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立即在城乡各地广贴安民布告，以安定人心。

第三次机构成立的时间是在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机构名称是：建阳县人民工作委员会。

五月底，四兵团入闽部队因另有任务，奉命调离闽北，由五兵团的部队负责接管四兵团所解放的各县，鉴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原治安委员会的机构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对建阳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阳城防警备司令部，由一五三团政治部副主任孙思明同志负责，在城防警备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建阳县人民工作委员会，委员有十三名，其中七名由解放军的代表担任，其余六名委员由建阳地方人士担任。工作

委员会主任是孙思明，下设五个股，各股股长均由解放军代表担任，副股长由地方人士担任。

第四次机构更易是成立中共建阳县委和建阳县人民民主政府。这届政府存在的时间是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廿一日，共两个多月。

这个期间的形势是，二野的部队已全部离开闽北向大西南进军，闽北的工作由陈贵芳同志组建的中共建阳地委和各个县的县委与政府接管。为此，地委于六月九日发出成立建阳县人民民主政府的通知。由于当时人手少，只好把我从浦城调来建阳，负责组建中共建阳县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虽然我在专署有职务，但只挂个名，实际上主要在建阳县工作。六月十一日，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庆祝民主政府成立。六月十五日，由我主持召开了有各乡主席、各保甲长、各中心小学校长、教师等人员参加的会议，向他们宣布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并正式开始工作了。

当时，建阳县人民民主政府的组成人员只有四人：县长张翼，县政府主任秘书曹常泰，公安局长叶宗忠，财粮科长高振良。中共建阳县委由三人组成：我任县委书记，叶宗忠任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高振良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城工部的五位同志，当时他们的冤案尚未了结，只能分别安排到财粮科、交通科、教育科去干具体工作。

第五次机构更易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因为这个时候山西南下的干部来了，我调回专署工作，建阳县的工作便移交给南下的同志。我记得南下的同志是七月底到达建瓯的，移交手续是在建瓯办理的。县长职务由南下的李一农同志接任，县委书记的职务由赵毅

同志接任。叶宗忠同志不再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但参加县委班子任县委委员，高振良同志专任财政科长，不再担任县委委员和宣传部长。原来的主任秘书曹常泰改任第一秘书，南下干部张之俊担任第二秘书，公安局长由牛静华接任，叶宗忠同志改任副局长。这次南下的干部很多，都安排到各个机构去担任职务，这里不一一叙述。

这次机构更易有两个特点：一是县委、政府分开设立，同时成立了许多相应的工作机构，各方面的工作随之全面铺开。二是县以下增设区委和区公所这一级机构，各区均由南下的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和区长，领导和逐步改造旧乡镇的机构和人员，全县乡镇由14个划为17个，使农村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我们共产党人坚持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主要目的是摧毁压迫剥削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新政权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从解放初期的情况看，首先必须保障人民的现实利益不受损害，保障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要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一要稳定社会秩序，二要支援前线，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我们在接管旧政权，组建新政权的同时，着重抓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全力支前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

首先归功于人民解放军的表率作用：5月11日凌晨4时解放军进城时，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了，没有发生战斗，城里的居民大多都在睡梦中。我们的解放军同志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大家都露天睡在马路上。天亮以后，当人们打开大门时，第一个照面所见到的情景，就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人心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

用。因为人们对国民党残兵败将途经建阳烧杀掳掠的可怕情状，记忆犹新。这一鲜明的对比，使人们因受到反动宣传而产生的惊悸之心顿时消失殆尽。

其二、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大量翻印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在城乡张贴。并根据约法八章的精神，发出通告：1、要求各机构的旧人员和各乡保长，限期前来报到，各尽职守，认真工作；2、通知各中小学教师尽快返校复课，孩子一进学校，家长就安心了；3、责令旧人员对粮、钱、档案要妥善保管，没有命令不得妄自动用；4、各单位、各乡镇的枪支弹药一律要登记上交，不得隐瞒不报；5、所有反动党团和散兵游勇均要到政府登记，跑掉的通知其家属，劝其返回，其组织宣布解散，停止活动。

其三、要稳定社会，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特别细。首先是对留用人员进行政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好好工作。因此，我们在那段时间里，对留用人员的学习抓得很紧。规定每天学习两次，上午从10时至11时半，下午从5时至6时半，主要讲政策，讲形势，帮助他们解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留恋之情与某些幻想，消除其对我党我军的疑虑，放下包袱，安心工作。第二、抓中小学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学校的公民课与童子军训练取消掉，开设政治课，由各校选派出代表定期集中，由解放军对他们讲课。回校后向本校教师、学生讲授，收到很好的效果。效果之一是，随后有很多学生自动报名参军随二野到大西南去，还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了本县的筹粮工作队。第三、抓同业公会的工

作。当时，建阳共有三十三个同业公会，如理发业有理发公会，民船业有民船公会等。这是国民党时期的群众团体，其中虽然有些被坏人操纵，但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我们的贫苦兄弟。当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困难，我们就帮助他们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对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和随后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支前运粮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及时开好祝捷大会，解除部分群众中存在的怕变天的思想疑虑。当时，由于二野入闽部队奉命离开闽北前往大西南，三野部队还未入闽，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建阳等因素，引起部分群众的疑虑。为了振奋人心，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祝捷大会：5月20日召开庆祝建阳解放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有二千多人，会后，组织秧歌队、腰鼓队上街宣传。6月3日，召开庆祝北京、上海、天津解放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有七千人。6月11日又召开庆祝建阳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参加的群众更多，号称万人大会。这三次大会的召开，对振奋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五，清理反动党团组织。国民党统治时期，建阳的反动党团有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青团、青红帮及六个同乡会。清理时，按约法八章的规定办理，责令其成员到政府登记，宣布其组织解散，其成员一律停止活动，枪支弹药要上交，外逃的要通知其立即返回到政府登记。其中，对同乡会的成员要区别对待，对混进其中的坏人要与反动党团分子同等对待，对一般成员则不予深究。

全力搞好支前工作：

经历过这段工作的同志就知道，当时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严峻

的，要完成的支前任务又是相当艰巨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来证实当时的严峻、艰巨程度：一、时间集中，过境部队人数众多。二野有两个师要离开闽北，十兵团大军入闽，号称十万之众，时间都集中在七、八月。二、建阳是闽北的交通要冲，大军进出都要经过建阳，建阳是第一站，无论进出的大军，经过建阳时，都要供应粮食、柴草和蔬菜，需要供应的数量十分巨大。三、我们的人手非常少。前面已说过，包括城工部的同志，我们一共才九个人，何况当时城工部的同志的冤屈还没解除，不敢重用他们，我们的人手就更少了。四、六月九日发生洪涝灾害，许多公路、桥梁被洪水冲毁，影响交通，七月九日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建阳城区，东、南门及中山路被烧成一片灰尽。这场大火，把我们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粮食、柴油、汽油、机油烧掉许多，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与艰巨的任务，我们自己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唯一的办法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为支前服务。首先组织群众性的筹粮工作队，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发动师生参加支前宣传和筹粮工作。其二，依靠部队驻建阳的后勤人员进行筹粮。其三、充分发挥民船公会的作用，组织所有民船日夜运粮。其四，动用旧乡保长的力量，将任务交给他们，限期完成，为防止他们阳奉阴违，我们派出筹粮工作队深入各乡镇，与他们一起筹粮。其五，发动社会力量摸清全县粮食大户的底子，向其借粮，发给凭证，顶交公粮。

到八月中旬，我们的支前任务基本完成了，没有影响部队的进军，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突出的动乱事件。这个

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当时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频频传来的捷报，既振奋人心，又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其次，应归功于解放军的帮助。我们进城接管，搞地方工作，是解放军手把手地教我们干的。第三，应归功于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如建阳邮电局的职工，从5月11日起没有停止过通邮通讯。水南汽车修配厂在大军过境期间，所有车辆的修理任务都是他们承担的。公路段的职工在5月25日就复工了，六月九日大水后，在及时抢修桥梁、涵洞工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民船公会在舒海水同志的带领下，上跑麻沙、将口，下跑建瓯，日夜运送军粮。建阳三家碾米厂日夜加工军粮，电厂保证用电需要，特别是建阳中小学校的教师、学生，在解放初期出了很多力，随后又踊跃参军。总之，离开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完成如此繁重的支前任务，是不可能的。第四，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地委，就在建阳，我们得到地委的直接领导，得到地委的有力支持。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九个参加建阳解放初期工作的干部，一点作用也没有。确实，我们在胜利的鼓舞下，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水平，没有工作能力，不懂得新时期的工作方法。但有几条我们是懂得的：

一、我们自己几个人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县委和政府两个班子更要紧密团结，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同志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寸步难行的。

二、我们明确必须紧紧依靠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存在和事业的发展，这一点我

们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三、要艰苦奋斗，吃苦是我们上过山打过游击的人的看家本领，我们不仅做到给部队供应什么，我们吃什么，而且做到当某种物资短缺时，首先保证部队需要。

四、领导深入实际，事必恭亲，决不假手他人，不当光听汇报，只发指示的官僚。

今天来反思四十年前的这段工作，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缺点是很严重的。第一，我们在情况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投入战斗，以至当南下的同志来到时，我们也没可能将建阳的全面情况、历史情况向他们作个介绍，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第二、工作没有全面展开，就连留用的旧人员的情况，也没有时间去了解透彻，给后来的同志增加很多麻烦。第三、在任务重、时间短的情况下，乡村基层政权几乎原封不动，如黄坑乡，在当时就不听从我们的指挥，我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解决。

我们在建阳的工作就只做成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状态，以至当我们将建阳工作移交给南下的同志之后，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对此，我既表示遗憾，也请南下的同志给予理解与谅解，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么几个人，这么短促的时间，这么繁重的任务，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兼顾其他了。

（本文根据张翼同志1989年5月11日在建阳县纪念建阳解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记录整理摘编，未经本人审阅）

记录：祝笑白、曾祥建

整理摘编：李一南

建阳县解放初期建立武装区公所情况

赵毅口述

詹宝容整理

1949年5月建阳解放，建立了中共建阳县委、县人民政府。8月份，我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李一农任县长，赖求兴任县大队长。当时建阳刚解放，土匪多，大军又南下继续解放南方广大城市和乡村，县大队力量有限，还肩负着警卫机关、保护水南桥、银行、仓库等任务。当时南下同志刚来，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不通，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但一时对党的政策不理解，疑虑多，有的听了谣言，怕党站不住脚等。在这样形势下，我们既要贯彻省委提出的“吃饱饭、打胜仗”的号召，支援全省解放斗争；又要注意保护干部。建阳刚解放，新政权只建到区，区以下暂时利用原有的保甲制度，控制保甲人员为我服务。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区公所，当时县委研究决定采取了建立武装区公所的办法，将全县划分五个区，建立五个区公所，每个区按10人建制，1、干部8人，即党委和行政各四人，党委设区分委书记、分委秘书、组织和宣传委员各1人，行政设区长、民政、教育、财粮助理员各1人。2、勤杂2人，即通讯员、炊事员各1人。武器是从县大队调出100多枝长、短枪，发给区公所人员，人手一枝。五个区公所设在所在地，公开挂牌。但人员采取流动灵活的游击方式进行工作。如第

三区公所设在徐市，但人员不固定在徐市，晚上全体人员转移到离县城近的回瑶等地。第四区公所设在莒口，晚上全体人员转移到后山等地，选择有利地形，轮流站岗放哨，集体睡觉，集体行动。白天到边远多事的村庄工作就全区公所的人员一起去。如一区公所到彭墩，二区公所到崇维、后畲，三区公所到条岭。到离城近，安定的村庄就三、五人一组去。

这样做的好处多，作用大：1、为干部本身壮胆，树立了工作信心和勇气，真正尝到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味道。2、人民群众看到区公所人员有枪，群众情绪比较安定，积极分子解除顾虑敢于靠近我们，有的跟上区公所活动，如带路等。3、对敌人、土匪和一些当地的地主恶霸、通匪分子等反动势力起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和轻举妄动。武装区公所的形式一直坚持到全县分批开展土改。

实践证明，建立武装区公所是新解放区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它不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当时各项任务，而且为民主建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农会，基层政权的建设就是在土改的基础上进行的。

解放初期征粮工作点滴

刘 明 森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党中央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

斗檄文。四月我军挥戈南下，长驱直入福建，五月水吉县城解放。此时，我主力部队急于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入闽的部队虽多，但留下来极少，地方干部缺乏，力量单薄，而军需粮草支前任务十分艰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我于1949年7月参加了征粮工作队，现就亲身经历，作回忆记叙如下。

我原在大梨一片搞征粮支前工作。1950年春节过后，被抽调支援二区（下乾）。在到达二区的第二天，我和其他六位工作队员，在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护送下，从下乾出发步行去龙村。队伍行至龙溪时，已是晌午时刻，带队的乔品同志（区委组织委员），一方面打发人烧午饭，另一面在门口及高处布哨站岗。刚吃过午饭，我在翻弄草鞋，抚摸被磨起泡的双脚时，突然有一群众报告说，上杉溪发现土匪抢劫。经分析，上杉溪有个地主名叫陆霖汉，小名金标仔，曾当过伪联保主任、乡长等职，是已露身份的匪首，在这一带造谣、威胁、抢劫、勒索，无恶不作，群众痛恨，此时正是我们为民除害的时机了。经动员后，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忘了脚痛，跑步前进。到了村前，大家匍匐前进，出其不意，枪声四起，打得土匪屁滚尿流，丢下“肉票”四人、毛猪一头以及其他抢来的物资。我们把被绑架的人质“肉票”松绑，宣传党的政策，并发还被土匪抢来的物资后，继续前进，于下午四点到达龙村。

被土匪绑架的群众，挑了被土匪抢去并分割成数腿的大毛猪以及红酒数竹筒，尾随我们来到龙村。对我们解救之恩，感激涕零，并说如不是我们解救他们，就要家破人亡，硬要我们收下他们的毛

猪和红酒。我们抓住机会，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解救水深火热中的群众，是我们的职责。围观的群众有几十人，都很感动。但被解救的群众，怎么说都要我们收下他们的慰问品，最后竟跪在地下不起来。无奈，带队同志见盛情难却，即收下一个带毛的猪头，其余的全部退回。老游击队员范昌棋提议用猪头煮锅边糊吃，三十多人美美地吃了一餐。边吃边发言，你一言他一语地说：“土匪是乌合之众，是邪道，经不起我们打；我们一个能打败土匪一百个。”这餐饭，变成了庆功大会、誓师大会，鼓舞士气的大会。

龙村地处水吉、建瓯、政和三县交界处。原属国民党乡建制，隶属水吉县领导，解放后划归二区管辖，1956年并入建瓯。在这里工作阻力和难度很大，主要不利因素有：第一、地僻人稀，村落分散，距区公所35华里尽是山峦重叠的山路，交通闭塞，连一部电话都没有。第二、国民党溃逃时，组织应变会和布署军政警特人员收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组织土匪武装，都潜伏在这一带深山老林中，左前右后常有股匪活动。第三、封建势力较强，大庙、天堂山、仰坑一带以及邻县建瓯小松等地，打着保卫家乡旗帜，组建大刀会，有的群众被匪特蒙骗利用。第四、国民党原有乡镇保甲制度没有推倒。根据当时政策，伪职人员一般都原职留用。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很难对付。第五、我们对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认识不足，有些罪恶累累的匪首也未加及时镇压，误认为杀人会影响瓦解工作，造成宽大无边的偏向。因此，又滋长了敌焰，匪患突增。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讲宽大。”导

致社会秩序一度混乱，群众有顾虑，工作难开展。

我们驻扎在龙村，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征粮入库，支援前线。对象是向地主、富农等大户征粮，发动贫下中农肩担运粮。经过一段艰苦工作，我们征集粮食五万余斤，并对原有粮食进行封仓查库，发动群众往下垵送粮。对狡猾的大户，有粮不交的，我们就把他们扣押起来，进行批斗。潜伏这一带的土匪，蠢蠢欲动，把我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把插入他们心口上的一把尖刀拔掉。由于我们的警惕，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但对于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匪特，我们缺乏认识，没有发现。我们开会研究拔营去杭头的时问、线路，被躲在隔壁间留用的旧乡长黄志信偷听去了。他把这一情报密告上山为匪的伪乡长、土匪营长张祥瑞。张纠集匪徒百余，埋伏在离龙村不远的鹁子岭，当我工作队进入敌人埋伏圈，遭敌人突击，造成一班战士死伤七人，工作队员林元成壮烈殉职，队长乔品同志光荣负伤。

这是1950年3月的一天，我和林元成、乔品、陈竞英、叶礼仁、邓星辉以及带路的民兵等人，从龙村周厝炮楼出发，走完一片宽敞的田垵，再沿荆棘蔓延的沙洲河边，走到一座桥头。这座桥叫橄榄桥，只供单人行走。这天天气晴朗，气候较暖和，走完这段大约五华里路程，加上多数人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路上欢歌笑语玩耍活动，走至桥边个个身上发热冒汗，在桥头脱掉部份衣服后，就排单行过桥。然后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开始爬越鹁子岭。大约只爬了十多分钟陡坡，忽听枪声大作，土匪躲在工事里，居高临下，向我们密集射击。瞬息间，一个班的战士和工作队员被分割成